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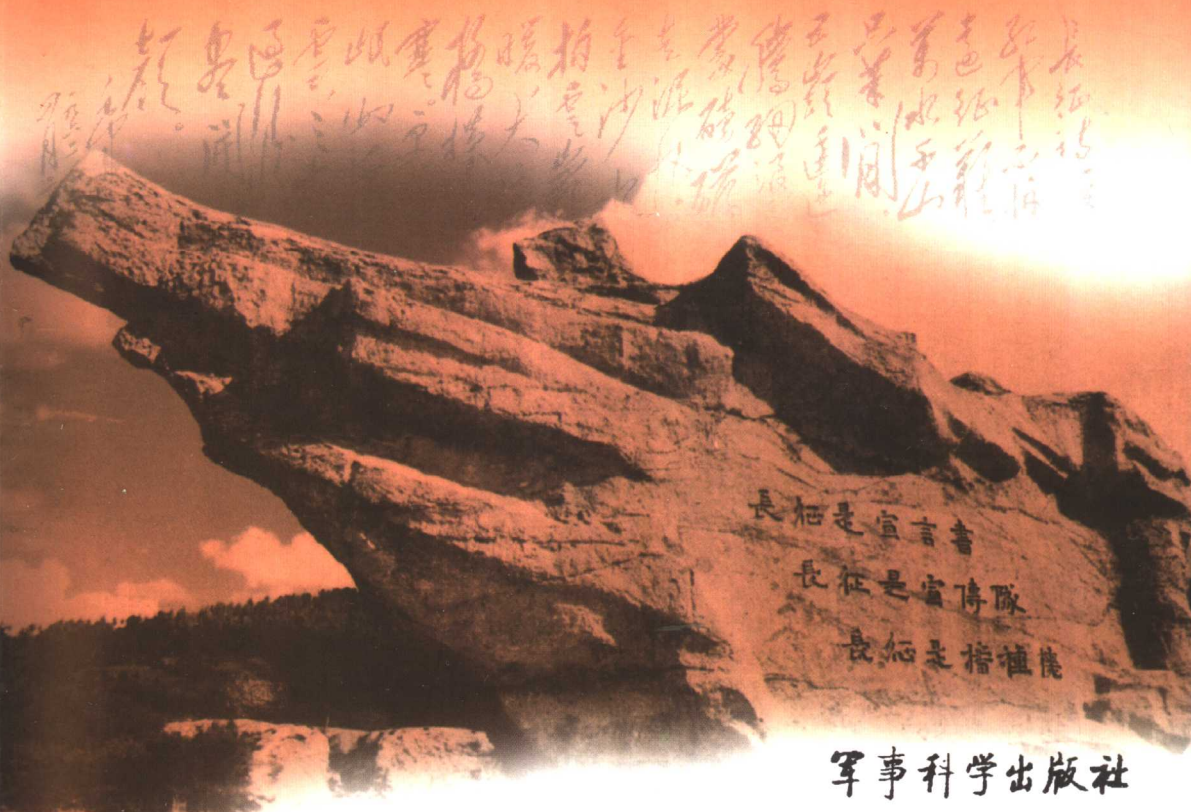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三)

红四方面军征战记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红四方面军征战记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编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四方面军征战记/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著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 2006. 5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
ISBN 7-80137-966-7

I. 红... II. 军... III. 红四方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 (1934~1936) —史料 IV. ①E297.2②
K264.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9822 号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青龙桥/邮编:100091)

电话:(010)62882626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鑫海达印刷厂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版次: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张:15.5

印次: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241 千字

印数:3001—8000 册

书号:ISBN 7-80137-966-7/E·655

定价:31.00 元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编写领导小组

组 长：葛东升

副组长：姚有志 寿晓松 齐德学

成 员：王江琦 李鹏青 赵一平 温瑞茂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全史》编写组

主 编：徐占权

副主编：陈 力

编写组成员：徐占权 陈 力 翟清华 王建强

本卷撰稿人：王建强

特邀摄影记者、高级摄影师：于利祥

引 言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之一。1935年5月初，红四方面军西进岷江，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随后，鏖战北川河谷，成功扼住西进岷江的通道，并西进懋功，接应中央红军。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北上方针，克服重重困难，激战包座，打开了进军甘南的门户。此后，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被迫南下。虽然广大指战员浴血奋战，誓死拼杀，但战略上的错误却使南下红军遭受严重损失。百丈决战后，红四方面军西进甘孜，与红2、红6军团胜利会师。两军随即坚决北上，取得岷洮西战役的胜利，实现了北进甘南的计划。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会宁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在历时1年零5个多月的长征中，红四方面军历尽艰辛，转战川、康、甘、青4省，经历大小战斗千百次，冲破了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并在沿途宣传了革命思想，播下了革命火种，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经过长征熔炉的锻造和淬火，红四方面军成为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惧任何强大敌人的钢铁战神，成为全中国人民团结御侮的坚强骨干和宝贵中坚。

红军长征，不仅以其史诗般的壮举、丰碑式的伟业，震惊了世人，更为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留下了永恒的长征精神。历史和实践证明：长征精神不但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反而会放射出日益夺目的灿烂光彩。作为整个红军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四方面军长征，无疑是孕育长征精神的主要母体之一，对长征精神的丰富和诠释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性作用。

红四方面军长征所创造的辉煌业绩，丰碑永铸，万代流芳！

目 录

CONTENTS

引 言	(1)
第一章 “川陕甘计划”夭折,红四方面军被迫战略转移 ...	(1)
一、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制定“川陕甘计划”	(2)
二、依托老区,向川甘边发展	(9)
三、被迫战略转移	(19)
第二章 红四方面军北川鏖战,与中央红军会师	(26)
一、鏖战北川河谷,扼住西进岷江通道	(27)
二、西进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	(38)
第三章 红四方面军第一次北上	(57)
一、张国焘向中共中央发难,反对北上方针	(58)
二、张国焘延宕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	(68)
三、取得包座战斗胜利,打开进军甘南的门户	(85)
第四章 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	(103)
一、张国焘执意南下,红一、红四方面军 合而又分	(104)
二、张国焘非法成立第二“中央”	(116)

三、发起绥崇丹懋战役,挥师川康边 (127)

第五章 红四方面军南下受挫,退守甘孜 (135)

一、百丈折兵 (136)

二、实施《康、道、炉战役计划》,红军
撤离川西 (154)

三、甘孜休整 (168)

第六章 红四方面军第二次北上,胜利结束长征 (181)

一、与红2、红6军团在甘孜胜利会师 (182)

二、进行岷洮西战役,实现北进甘南计划 (193)

三、抵制张国焘西进主张,继续北上 (210)

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胜利结束长征 (225)

主要参考文献资料 (236)

后 记 (239)



第一章

“川陕甘计划”夭折， 红四方面军被迫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转移到川北地区后迅速发展至约8万人，并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根据地。随后，红四方面军苦战10个月，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为迅速恢复长期战争对根据地所造成的损伤，红四方面军制定并实施了以“依托老区，发展新区”为基本指导思想“川陕甘计划”。但是，由于张国焘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性错误，“川陕甘计划”夭折，红四方面军被迫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



一、召开清江渡军事会议,制定“川陕甘计划”

1931年11月7日,在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欢呼声中,鄂豫皖根据地红军第4、第25军在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许多年后,时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成立时激动人心的场面,依然记忆犹新:

七里坪,位于黄安县正北,是个不小的集镇,鄂东北特区最早的“首府”。有条主要街道,两旁开着些小店铺,比较热闹,被命名为“列宁街”。西门外的倒水河清澈见底,宽阔的河床铺满雪白的碎沙石。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是在倒水河河滩上开的。那天人山人海,锣鼓喧天,红旗如林,刀枪耀目;部队武装整齐,精神抖擞;周围的田坎、山坡上,聚拢着无数前来庆贺的群众。选择十一月七日这一天在七里坪召开红四方面军的成立大会,有两重意义:一是为了庆祝“十月革命节”;二是七里坪乃当年黄麻起义队伍首次集合攻打黄安的出发地,因而也是大别山区第一支工农红军的诞生地。

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鄂豫皖根据地红军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标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鄂豫皖人民进行4年革命战争的胜利成果。它使部队在建设上提高了一大步,在作战行动上更加集中,指挥更加统一,从而为进行更大规模的运动战创造了条件。从此,这支近3万人的主力红军纵横驰骋,屡胜强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曲英雄战歌,为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11月10日起,成立仅仅3天的红四方面军,连续进行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等4次战役,取得了辉煌胜利,共歼国民党军约6万人,使蒋介石准备对鄂豫皖根据地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计划胎死腹中。在作战中,红四方面军创造了避强击弱、包围迂回、围点打援等战法,为中国工农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红四方面军发展到4.5万余人,鄂豫皖根据地扩大到4万余平方公里,拥有26个县级政权。





然而，由于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的“左”倾冒险错误，红四方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1932年10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10、第11、第12、第73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平汉铁路（今北京—汉口），经鄂北、豫西西进。11月，到达陕南地区。11月19日，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改称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继任主席。12月，红四方面军乘四川军阀混战及其在川北兵力薄弱之机，进军川北。至1933年2月，红军成功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根据地。

这时，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以近6万人的兵力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经4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粉碎了川军的“三路围攻”，共毙伤其1.4万余人，俘其1万余人，同时川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扩大。

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县木门镇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作战经验，并根据部队和地方武装已有很大发展的情况，正式决定将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

根据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于7月上旬进行扩编：以第10、第12、第11、第73师为基础，每师充实部分地方武装，依次扩编为第4军（王宏坤任军长，周纯全任政治委员，辖第10、第11、第12师）、第9军（何畏任军长，詹才芳任政治委员，辖第25、第27师）、第30军（余天云任军长，李先念任政治委员，辖第88、第89、第90师）、第31军（王树声兼任军长，张广才任政治委员，辖第91、第92、第93师）。各军的司令部、政治部也以原来各师的领导机构为基础建立起来。此外，各军还直辖有医院、修械所、担架营及一个包括侦察、通信、警卫、工兵等分队的特务营和一个迫击炮连。经过扩编，整个方面军达到4万余人。

这时，川陕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领导机关是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主席，陈昌浩、徐向前任副主席，曾中生任参谋长。下为方面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总政治部主任，傅钟、曾传六任副主任。

8至10月，为进一步扩大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乘川军新的围攻部署尚未就绪之际，进行了仪南、营渠、宣达3次进攻战役，共歼川军近2

万人。宣达战役期间,红四方面军同在达县(今达川)、宣汉、梁山(今梁平)地区坚持斗争的川东游击军会师。随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33军(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治委员,辖第97、第98、第99师)。

至此,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均达到全盛时期。红四方面军发展到5个军约8万人,地方武装除陆续补充主力红军外,仍有1.5万余人,赤卫军、少年先锋队等群众武装有数十万人。川陕根据地发展到东起城口近郊,西抵嘉陵江沿岸,南起营山、达县,北至陕南之镇巴、宁强,纵200余公里,横250余公里,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并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仪陇、营山、宣汉、达县、万源等8座县城。

对于红四方面军创建、巩固和扩大川陕根据地的成绩,远在中央根据地的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1934年1月23日,他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

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远征,在辽远的中国西北部,开展了广泛的群众革命斗争,把苏维埃的种子广播到革命形势比较落后的区域中去了。红四方面军的英勇善战,在不足一年之内,已经在二十余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已经发展了十倍以上的红军队伍,号召了整个四川的工农劳动群众与白军士兵倾向于苏维埃革命,在中国西北部建立下苏维埃革命新的强有力的根据地。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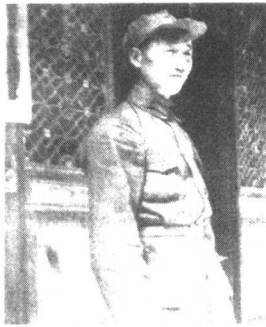
红四方面军征战记



▲ 张国焘



▲ 陈昌浩



▲ 徐向前





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 and 意义。

从1933年11月中旬到1934年9月中旬，即中央根据地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四方面军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六路围攻”作战。与中央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结局相反，反“六路围攻”以红四方面军的胜利而告结束。在历时10个月的艰苦作战中，红四方面军有计划地收紧阵地，适时实施反击，取得了辉煌战绩，总计毙伤川军6万余人，俘虏2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挺）、炮100余门，并击落国民党军飞机1架，基本恢复了宣达战役后的根据地辖区，并扩大了部分新区。

被红军打得焦头烂额的四川军阀，此时陷入一片混乱，呈一蹶不振之势。面对惨重失败，曾在围攻前叫嚣“三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红军的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束手无策，只得致电蒋介石请罪，表示“难乎为继”，请免所兼各职。在从成都回重庆的途中，他实在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还演出了一场假投江的丑剧。

坐镇南昌指挥“剿共”的蒋介石，虽然对“六路围攻”的失败既震惊又恼火，但为稳定四川反动统治，不得不于9月30日电促刘湘“即日遵命复职，重行区分，提携进剿，以资振作”。同时，他命令西北军的杨虎城“迅伤陕南各军袭击匪后，以资呼应”。两天后，他不顾“围剿”中央根据地的作战正处于最后收尾的紧张阶段，飞赴西安亲自策划“川陕会剿”。在蒋介石的安抚和鼓励下，刘湘似乎也来了精神，于10月22日通电复职。不久，他又亲自赶赴南京，三次面见蒋介石，请示“安川大计”，加紧筹划“川陕会剿”。

面对严重敌情，红军下一步究竟如何动作？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徐向前等都在认真酝酿，反复思考。

经过10个月的反“六路围攻”作战，川陕根据地因战争的破坏和消耗，元气有所损伤，土地荒芜，粮食匮乏，断瓦残垣，满目疮痍。这是红军决定下一步战略方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但是，经过反“六路围攻”作战的锻炼，红四方面军以及根据地党组织和人民作战经验更加丰富，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倍受鼓舞。这又为红军克服根据地经济困难，争取更大胜利准备了有利条件。

1934年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军事会议在巴中县清江渡的一所小学校里召开。会议由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主持,各军、师的军政主官及少数团的干部参加。会议总结反“六路围攻”的经验,结合当时情况,研究部队军事建设和训练工作,制定了军事教育、参谋、经理、医务、组织等工作大纲。会议的重点是研究打破国民党军“川陕会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

经过充分酝酿、冥思苦想,徐向前在会上提出了“川陕甘计划”。“川陕甘计划”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依托老区,收缩战线,发展新区,主要打击的目标是“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胡宗南部,重点夺取甘南的碧口和文(县)、武(都)、成(县)、康(县)地区,并伺机向岷县、天水一带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

对于这个计划的考虑和可行性,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第一,盘踞甘南和川陕甘边的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川陕会剿”的主力部队。该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作壁上观。而消灭胡宗南部,正是粉碎蒋介石“川陕会剿”计划的重要一着棋。第二,碧口和文、武、成、康地区,座于汉水和白龙江流域,临山傍水,人口不少,利于我军解决物资和兵员补充问题,摆脱眼前的困难。第三,依托老区,进取甘南,比较稳妥可靠。我军进退自如,有回旋周转余地,不致造成无后方作战的危险。

基于这样的认识,徐向前在会上胸有成竹地指出:“从各方面条件看,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只要我们集中三个军以上的精锐部队突然出击,不惜花上大的代价拿下甘南的战略要地碧口,打开战局,搞掉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一批自动步枪、火炮,装备会大大加强,弹药也能得到很大补充。有了新的根据地,既能减轻老区人民的负担,又能解决粮食、兵员等困难,粉碎敌人的‘川陕会剿’,要好办得多。”

对于这个切实可行的计划,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举双手赞成。原来,早在反“六路围攻”的后期,他和徐向前住在一起,剪烛夜话,曾





经谈过这方面的内容。当时，徐向前认为，川陕根据地经过10个月的战争消耗，人力、物力、财力几尽枯竭，尤其是粮食缺乏，更令人忧虑。为图发展计，不如趁田颂尧部溃不成军之机，红军以一部兵力跨江而进，在苍溪至南部之间先搞块天下，使根据地沿嘉陵江两岸发展。如果万一站不住脚，部队还可以回来。李先念认为，这是一个颇具战略远见的行动计划，表示完全同意，并且补充说：“如果部队在苍溪和南部站住脚后，下一步最好沿江向北发展，打击胡宗南部，把川甘边搞到手，与川陕根据地联成一片。”徐向前高兴地说：“那就更好啦，文、武、成、康到手，我们还可以向北发展。”第二天一大早，李先念就派人侦察渡口，收集船只，布置任务，准备以第30军主力渡江，进击南部。可是，张国焘这时打来了电话，不同意渡江。理由是东线刘湘的部队有进攻江口的可能，要准备对付刘湘的进攻。这样，渡江作战的计划遂付之东流。宝贵战机的丧失，使徐向前和李先念惋惜不已。现在，徐向前明确提出“川陕甘计划”，李先念当然高兴得很。

然而，对于红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有着自己的算盘。早在鄂豫皖时期，张国焘就说过：“只要有红军，苏区要不要都可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张国焘看不到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战略意义，认为中央红军撤离中央根据地后，川陕根据地将成为蒋介石的进攻重点，从而对坚持川陕根据地的斗争发生了动摇。他甚至得出了“与其让敌人赶走，不如主动撤走”的逃跑主义的错误论断。

清江渡会议期间，在与徐向前的闲谈中，张国焘流露出了放弃川陕根据地的想法。徐向前回忆道：

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据我观察，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不过没有明说就是了。我说，西渡嘉陵江的战机已经丧失，敌人筑碉防御，我们再向南部一带发展，有很大困难。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余地不大，去不得的。我看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比较好。因为是随便交谈，他对我的意见未置可否。

会上，张国焘提出，反“六路围攻”中根据地消耗很大，难以再坚

持长期斗争，因此应向甘肃南部发展，方面军的后方向甘南转移。这个意见，实质上是要放弃川陕根据地。徐向前等多数人坚持认为，川甘边界是比较有利的发展方向，根据地也需要向外发展，但不同意转移后方放弃老根据地，而主张依托老区发展新区。张国焘见自己比较孤立，就没有再坚持其错误意见。这样，清江渡军事会议最终通过了“川陕甘计划”。

反“六路围攻”作战结束不久，红四方面军即转入整训，同时协助地方党组织和工农民主政府，恢复和开展地方工作，整理与发展地方武装，并扩大红军。整训开始之初，由于部队在反“六路围攻”中有不少减员，且有些单位已经缩编，为健全领导机构和充实连队，又作了必要的组织调整工作：第4军编为2个师7个团，第9军编为2个师6个团，第30军编为3个师9个团，第31军编为2个师6个团，第33军编为2个师4个团。整个方面军共计11个师32个团。此外，妇女独立团仍保留原建制。方面军的炮兵营扩编为炮兵团，下辖5个连。各游击指挥部所属的武装，则合编为独立第1师和第2师。原彭杨军政干部学校，于11月间改称红军大学，内设高级干部班、中级干部班、军事连、政治连及特种兵班。

在整训中，各部队根据方面军政治部颁发的《全军中心口号》及其他有关材料，反复进行冲破“川陕会剿”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普遍进行“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的军训训词的教育，并举行军训训词宣誓，从而有力地鼓舞了部队的练兵热情和战斗意志。各部队根据清江渡会议制定的《军事教育计划大纲》，掀起了新的练兵热潮。这次练兵，在技术上，以射击、投弹为主要训练内容；在战术上，以夜间战斗为主要训练内容。川军吃尽了与红军夜战的苦头，把红军叫做“天兵”，平时在住地十几公里外都派人整夜打更，提防“天兵”降临。红军狠抓夜战训练，就是要增强这一优势。对此，徐向前回忆道：

在训练中，各部队从严、从难要求，较普遍地掌握了以搭人梯（最高达七层，金字塔式的）或用长竿、铁勾、绳索攀登悬崖绝壁的技术，夜间动作一般地达到了迅速、敏捷、准确、无声息的地步。指战员们还结合实战经验，改进夜间联络方法，如用竹筒装火香，筒口朝后，除直接跟进的人员外，前方及两侧均不能发觉；用竹子作成“联络哨”，哨声





高尖特异，枪炮声中亦清晰可辨。

经过3个月的整训，红四方面军加强了部队建设和军政训练，补充了兵员、物资，进一步提高了战斗力，并且协助地方党政机关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恢复和开展，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做好了准备。

二、依托老区，向川甘边发展

正当红四方面军整训结束时，蒋介石正紧锣密鼓地加紧部署“川陕会剿”。他一面从经济上给四川军阀以支援；一面令胡宗南第1师接防广元、昭化，又令上官云相指挥第47、第54、第44师和独立第4旅向四川开进。同时，以贺国光为首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也于1935年1月间开进四川，以“运筹指导督察”川军“剿匪”，并乘机攫取四川省的军政大权。胡宗南狂妄地叫嚣：“第1师如果早入四川，共军就不会发展到这个地步了。”然而，由于川军在“六路围攻”中受创甚剧，内部矛盾重重，蒋介石又正在集中主力对付中央红军，“会剿”一时尚难开始。

1月22日，为贯彻清江渡会议确定的“川陕甘计划”，红四方面军集中18个团的兵力，主动出击，发起广（元）昭（化）战役。经过一周的激战，红军虽歼灭一部分国民党军，但由于广、昭两城的国民党军凭坚固守，弹药、粮食等给养充足，红军硬攻始终未能奏效。而这时，川军邓锡侯部5个旅已逼近广、昭，严重威胁红军侧背安全。鉴于敌情严重，徐向前遂命令红军撤出战斗，主动结束了广昭战役。

还在广昭战役进行之前，率领中央红军长征转战的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统治中共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际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从而为夺取长征的胜利，开创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就在红四方面军发起广昭战役的当天，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电文如下：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转入川西，

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完全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的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因我军入川,刘湘已无对你们进攻可能,你们若进攻刘敌,亦少胜利把握,与我军配合作战距离较远,苏区发展方向亦较不利。西线则田(颂尧)部内江,邓(锡侯)部将南调,杨(森)、李(家钰)、罗(泽州)兵单力杂,胜利把握较多,与我军配合较近,苏区发展亦是有利的。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同时我们要估计到敌人可能以较少兵力利用堡垒箝〔钳〕制四方面军,而乘野战军立足未稳之际,转移主力实行突击,以收各个击破之效。因此你们作战方针从速决定电复。

不言而喻,中共中央来电提出了一个牵动全局的行动方针问题。

接电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对中央来电作了认真的研究。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央要求红四方面军集中全力西渡嘉陵江,突入敌后,策应中央红军北进,也就意味着红四方面军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如果不是中央红军处境艰难,中央不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紧要的事。但是,嘉陵江昭化以南江阔水深,又有国民党军重兵防守,若无充分的准备,难以实施渡江作战。昭化以北渡江较易,但渡江后又有剑门之险,向南发展会遇到很大困难。经过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第一,暂停与胡宗南的角逐。第二,以第31军和总部工兵营迅速搜集材料,隐蔽造船,解决渡江工具。第三,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准备放弃城口、万源一带。第四,以一部兵力出击陕南,调动沿江国民党军向北,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军第25军。

根据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集中12个团的兵力,于2月3日发起陕

